



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文丛

影像、民族与社会变迁

金晓聚 ●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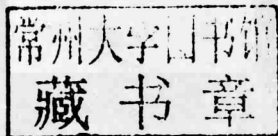


民族出版社

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文丛

影像、民族与社会变迁

金晓聚 ●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像、民族与社会变迁 / 金晓聚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105-13594-3

I. ①影… II. ①金… III. ①民族学—中国—文集 IV. ①C95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0706号

影像、民族与社会变迁

策划编辑 彭素娥

责任编辑 陈萱

装帧设计 刘海伦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12.375

定 价 42.00元

书 号 ISBN 978-7-105-13594-3/C · 393 (汉 315)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 010-58130104 发行部电话: 010-64224782

文丛总序

自1997年云南大学新闻系单独建系以来，就把“民族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主要方向。当时这样一个方向的确立，并非我们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未来有某种“先知先觉”，而是和云南大学整个学校的学科建设重点密切相关。民族学是那个时候云南大学文科学科发展的重点，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不少非民族学的学科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民族学靠近。

云南大学新闻学专业是1984年设置的，1985年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云南大学新闻学专业就在本科课程中开设了传播学课程。这与云南大学新闻专业的第一任教研室主任高宁远有着直接的关系。高宁远老师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来到云南工作，1958年被划为右派，2006年7月22日去世。1994年底，高宁远出版了《新闻传播基础理论》一书，从该书的内容框架来看，它已经与同时代国内出版的新闻学理论的教科书有较大的区别，书中出现了很多传播学的概念，如“信息”“传者”“受众”等。讲这方面的情况，并非要去强调云南大学新闻系传播研究的“悠久历史”，而是要讲在传播学进入中国不久，作为这样一所边疆大学一个新

办的新闻学专业，与传播学相关的内容在教学、教材中就有了具体体现。

恰巧就是在云南大学新闻系单独建系的1997年，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升格为一级学科。那个时期，就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情况来看，主要还处于译介阶段，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所开展的研究还不多见。因此，在建系之初，我们所开展的第一项立足于本土的研究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这项研究属于传播研究中的“发展传播学”的范畴，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合作，研究得到了云南省“省院省校合作项目”的资助。项目于1998年底立项，1999年全年都在调研，2000年成果出版。这样一个匆匆完成的项目，存在诸多的不足，但是这项研究也算是当时国内立足于本土所做的一项规模较大的实证研究。

这样一项研究，无疑是和云南大学新闻系当时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方向相吻合的，但是，在实施这个课题研究时，我们自己对于“民族”“传播”这样一些概念的理解，更多的是一种简单的借用，并未在学理层面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同时，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于量化研究的方法、理解和运用都还不是十分熟练。现在来看，这样一项研究最大的价值在于让我们走出校门，关注社会，关注云南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区域文化。

进入21世纪之后，云南大学新闻系的同仁在研究方向上和此前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在研究取

向上不知不觉地转向了人类学的民族志。2001年，后来成为云南大学新闻系教师的孙信茹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她的硕士学位论文。该论文入选2002年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研究生论坛”，并在论坛上获得好评。2003年，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云南大学新闻系教师郭建斌在云南怒江贡山县独龙江乡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题为《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的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第一个用民族志的方法完成的博士论文。据我们了解，当时国内也有一些西部地区的高校把“民族传播”作为自己学科建设的方向，但是在当时，在这样一个宽泛的概念之下明确地使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成果在一定范围内被国内新闻传播学界认可的，似乎还没有。

2009年8月，云南大学新闻系与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共建的“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在云南大学举行了揭牌仪式，恰逢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在云南大学举行。虽然研究所的成立与这一学术盛会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不是这样一项国际学术会议的一项内容，但是在内在逻辑上，这两者之间有关联。

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成立之后，当年就得到了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项目资助，在此项目的基础上，相关的课题又在2010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这样两个研究项目，在某种意义上再次把云南大学新闻系的学术

力量凝聚在一起，如同1999年开展的项目研究一样，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凝聚力的“学术共同体”。

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成立之后，做的另外一件事是着手国内第一套“媒体人类学译丛”的翻译工作，译者也主要是云南大学新闻系教师，该译丛至今已经出版3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所以想到翻译这样一批“媒体人类学”的著作，是因为我们感觉到西方“媒体人类学”的研究和我们目前所从事的研究之间有很多的关联，而国内人类学界对此关注的还不多，更为重要的是想通过这样一套译丛的翻译、出版，给国内新闻传播学科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学生提供某种借鉴。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云南大学新闻学专业开设传播学课程，到1999年开展第一项具体的实证研究，再到本世纪以来转向人类学方向，最后有了一个具体的学术平台。我们从一般意义上的传播学的讨论，最后落实到了传播研究中的一个具体方向——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研究方向上，是有研究成果支撑的。除了以前产生的学术成果之外，现在我们又有机会以“研究文丛”的形式来展示我们的学术成果。

这个“文丛”所收录的内容，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云南大学新闻系教师近年来较新的研究成果，共5本。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又分项目成果和博士学位论文两类。就项目成果而言，包括前面说到的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资助的项目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相

关的项目成果还有其他的，在这里只收录了两本。3 本来自博士学位论文，其中一篇与前面说到的项目有直接的关系，作者在云南大学在职攻读艺术人类学博士学位。另外两篇博士论文，一篇是作者在来云南大学之前完成的，在原来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修改；另一篇的作者是云南大学教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尤其是后两篇博士学位论文，看起来似乎和研究所的研究路径不大相同，一篇关于美国电视剧的文本研究，一篇是关于英国民族政策的研究。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是丰富了我们原来的内容和视角，并且较好地体现了一种国际化的视野。

第二类是从云南大学传播学硕士点十多年来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挑选出来的，这些论文虽然谈不上完美，但是在我们看来都是做得不错的论文，并且，这些论文与云南大学新闻系自 1997 年以来确立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以及后来的研究所力主的研究方向是一脉相承的。云南大学自 2000 年底获准传播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并于 2002 年招收第一届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民族与传播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方向。虽然后来学位点增加，学位点层次也得到了提升，但是“民族与传播研究”始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尽管这里收录的硕士学位论文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并且有些论文是在几年前完成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把这样一些在我们看来不错的论文集结出版，或许能够给学习新闻传播的学生们提供一种借鉴；或许还谈不上借鉴，那就

提供一个批判的靶子吧！

云南大学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是一个开放的学术平台，在这样一个学术平台上，我们几乎没有学科、专业的界限，而是围绕研究问题展开广泛的学术讨论。我们希望与国内外学术界、业界的同仁开展广泛的交流，我们也真诚地希望这个“文丛”能够得到各位有识之士的批评、指正。

郭建斌（云南大学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

2015年2月24日于昆明

目 录

编者导言

金晓聚 / 1

社区影像民族实践：摩梭文化的镜像自观

董进 / 6

镜里与镜外：“照相”与村民日常生活实践

——以昆明沙朗白族乡东村为例

冯济海 / 68

看的实践：互动仪式中的拍摄与分享

——以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水各旅游村为例

聂楠 / 168

一个傈僳族村寨的音乐传播考察

李晴 / 264

编者导言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原新闻系）于 2001 年获得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授权，自 2002 年开始正式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至今已有 360 多人完成学业并通过答辩，分别获得传播学、新闻学、文化传播及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学位。

本书所收录的五篇论文，皆从上述 360 多位毕业生的学位论文中遴选而出，虽然称之为“优秀”有自卖自夸之嫌，但在我们看来，这五篇论文（连同本丛书其他论文集所收录的毕业生论文）确实有某些共性和代表性，能够反映迄今为止云南大学新闻系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一大特色：在研究方向上对“民族传播”的偏好，在研究方法上对社会学、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借鉴，在学术关怀上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敏感。

诚如本丛书的主编郭建斌教授在《文丛总序》中所言：“自 1997 年云南大学新闻系单独建系以来，就把‘民族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主要方向。”这样做的原因在于“民族学是当时云南大学文科学科发展的重点，出于各方面考虑，不少非民族学的学科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向民族学靠近”。在这些历史性的因素之上有一个不言自

明的客观条件，即云南大学所在的省份（还可以扩展到毗邻的周边省份）拥有异常丰富的少数民族人文资源，为研究者提供了在一定时期内得天独厚的研究资源优势。

建立在这种资源优势上的“民族传播”研究偏好在这本书收录的论文中呈现为对某些少数民族群体的关注，而这种关注的切入点往往从现代媒介的某个表征入手。具体而言：董进的《社区影像民族实践：摩梭文化的镜像自观》选取的角度是从社区影像介入摩梭人的生活，以“第一届摩梭电影展”作为研究载体，考察摩梭人在影像中对自己的描述，从而反观摩梭文化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摩梭社会的变迁以及摩梭人已经消失或者濒临消失的文化传统，最终对摩梭人作为民族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和传承意识做出了较为肯定的结论；冯济海的《镜里与镜外：“照相”与村民日常生活实践——以昆明沙朗白族乡东村为例》选取的对象是白族，作者以昆明沙朗白族乡东村作为田野调查点，围绕“照相”这一现代媒介表象与村民日常生活实践这一主题展开，即揭示了“照相术”进入前现代社会时拍摄者与被摄者的权力关系，又在社会学意义上关照都市流行文化与民族乡村文化的交锋与交融，并最终将视角升华为当地人通过这一媒介表象反映出来的对待现代、传统与国家三者之间统一但曲折的认同感；同样是探讨照相术，聂楠的《看的实践：互动仪式中的拍摄与分享——以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水各旅游村为例》则更为形而上，这篇文章的个案选取的水族某个以旅游产业为主业的村落，重点

考察了在“旅游”这个资本的、现代的结构视角下与摄影相关的情境，作者通过“看的主体”“看的对象”“看的方式”三个方面，来描述照相术反映的当地人与外来者之间的互动情境；作为一种与影像同样直观的媒介表征，音乐同样得到了本书作者的关注，李晴的《一个傈僳族村寨的音乐传播考察》着眼于某个傈僳族村寨，对其音乐传播情况进行调查梳理，阐述了媒介作用下的傈僳族传统音乐、外来流行音乐的传播以及音乐形态的改变，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这种传播的主要媒介性和社会性因素。

本书作者们在研究方法上对社会学、民族学的借鉴集中体现在对“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的使用和对“民族志”式写作的自觉上。在本书的研究语境中，“民族”这个概念是与“乡村”或曰“农村”伴生的，因此本书所收的前四篇论文，不管是对社区影像实践的探讨，还是对音乐传播的考察，均建立在作者亲身奔赴乡村对少数民族生活的“参与式观察”的基础上。例如董进的《社区影像民族实践：摩梭文化的镜像自观》是以“参与观察、实地调研的方法”对“第一届摩梭电影展”的文本观摩与观众反馈进行分析，揭示“社区影像教育如何通过参与、反馈、分享的方式实现影像权利与话语权力的转化”；冯济海的《镜里与镜外：“照相”与村民日常生活实践——以昆明沙朗白族乡东村为例》亦建立在为期近60天的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之上，作者慎重地界定了自己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理想状态，并力图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

出发；聂楠的《看的实践：互动仪式中的拍摄与分享——以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水各旅游村为例》开篇序言即在颇具田野笔记风格的抒情调子中展开，行文中更有两次田野调查的观察与实践支撑着对“旅游村”中照相这种“互动仪式”的考察与论述；李晴的《一个傈僳族村寨的音乐传播考察》更加是一个缺乏实地调查与参与式观察就无法成立的研究——作者选取的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上帕镇依块比村本是一个普通的傈僳族自然村寨，缺乏充分的文字和影像资料，但作者详实的田野调查笔记展现了该村传统音乐传播的类型、外来音乐的状况、传统音乐与外来音乐两者融合在一起产生的新音乐的内容和音乐流变等情况。当然，不管选取何种研究方法，研究者的着力点仍在新闻学与传播学本身。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至少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物质生活形态的现代化，而更加微妙艰巨的层面则是社会人格的现代化——即现代性个体的形成；在影像、摄影和流行歌曲这些现代性媒介要素几乎不可阻挡地进入本书中这些少数民族村落的时候，它们无一例外仍然处于前现代社会的某个层级，这种进入或者入侵，将在何种程度上将其中个体熟悉的生活方式连根拔起再带向一个可知或者不可知的方向？在这些年轻的研究者们的有意识或者潜意识中，这才是最令他们兴奋或者紧张的部分。毕竟他们触目所及，是一种正在失落中的社会文化和生活形态，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观察即是见证

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谈论的“变迁”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因为精神生活质量衡量的主观性，使得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结果难以用“发展”还是“恶化”来定性。只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个中人的意愿如何，改变终将发生。所幸，在属于人类的地球上虽然从来未有应许的天堂，但在失落与痛苦中的抗争与建设，恰恰是人最宝贵的主体性所在。

5

最后，作为一本硕士生论文集，本书的作者们难免存在着诸如研究基础不够扎实、理论拔高好大喜功、行文笔力上仍显稚嫩等缺点，惟愿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金晓聚

2016年2月18日于密西根州立大学

社区影像民族实践： 摩梭文化的镜像自观

董进*

一、导言

2006年1月，在位于云南滇西北的宁蒗县泸沽湖一个摩梭村落，摩梭人尔青（摩梭语音译）举办了“第一届摩梭电影展”。在这次电影展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文化研究者、游客与摩梭人共同观看、讨论电影展放映的12部外来文化背景的导演专门拍摄摩梭人的影片：摩梭人怎样看待影视镜像中的自我？影视文化或者现代传媒社会对摩梭文化产生怎样的影响？游客如何通过这些影片来认知摩梭文化？摩梭人与游客、学者如何看待摩梭文化的自省与保护传承？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被提出。本文试图通过已被纪录的影展和讨论过程，分析社区影像在摩梭的“影像教育”活动。

* 作者为云南大学新闻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目的

拍摄摩梭人的片子非常多，但很多拍摄者只在泸沽湖呆过很短的时间，所拍摄的内容无法反映真正的摩梭文化。实际上，摩梭文化是非常丰富的。一部片子或者一份田野调查报告，并不能诠释真正的摩梭文化。所以，一个对摩梭文化了解多一点的人，他可以做到比较客观地反映摩梭文化，起到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但如果对摩梭文化了解得并不多，他就可能曲解摩梭社会一些特有的风俗，使观者形成对摩梭人的“刻板印象”。

利贝斯和凯茨在《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中，对在美国以外的地区播放收看《达拉斯》的观众进行了分析，其中考虑到作为大众媒介传播美国文化的转录与观看的解释，虽然作者提出对影像阅读的参照式解读和批判式解读两种分析模式，但没有考虑到《达拉斯》从英语翻译成其他语言，影像字幕转化过程对作品意义的改变。同理，作为拍摄者或者田野研究者，即使是对摩梭人及文化做了大量的调查，但作为非摩梭语境调查者，对摩梭语言的理解与转化，同样面临不同程度的消解与改变，摩梭文化经过汉语或者其他语言的翻译解释以后，其文化本来的意义也会随之有所变形。这是否意味着作为非摩梭语境的拍摄者和研究者始终不能进入和解释真正的摩梭文化？是否永远也无法跨过摩梭文化和自己所在的“非摩梭文化”之间的边界？问题推导可能会让“研究”本身成为一个哲学上难以企及的终极问题。